

# 新加坡 25年来的发展

游保生 林崇椰  
合编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出版

# 新加坡 25年来的发展

游保生 林崇椰  
合编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出版  
丰隆集团赞助

出版委员会

主席：黄锦西

委员：郭令裕

柯新治博士

编辑：游保生教授

林崇椰教授

翻译：南洋·星洲联合报翻译组

|     |     |     |
|-----|-----|-----|
| 陈新才 | 谢声远 | 陈青山 |
| 李凌千 | 吴鸣震 | 吴淑琨 |
| 符华林 | 潘奕好 | 朱成发 |
| 吴大洋 |     |     |

出版：南洋·星洲联合早报

发行：307, Alexandra Road, Singapore 0315.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版

ISBN:9971-87-159-9

# 前 言

新加坡在过去25年来，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自从1959年自治以来，平均国民所得，由该年的\$ 1,290 增加到1983年的 \$ 13,780，提高了近10倍。如果与欧美先进工业国的经济成长相比较的话，我们的成绩也是值得骄傲的。日本与美国在同期间的增加倍数分别是16和5。

这本书的出版，适逢新加坡建国25周年大庆，因此更具意义。我们认为新加坡的成就，是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计划正确制定和成功推行的结果。要了解新加坡25年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从各个方面去探讨，因此本书由十四位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来讨论。我们希望本书的经济资料能尽量完整，讨论和分析能尽量作到全面。由于原文是英文的，必须翻译成中文。有些文章是相当专门性的。虽然我们邀请了几位通晓中英两种语文的经济学者，包括柯新治博士，国立大学经济系的郑文雅博士，陈福博士及周顺明博士协助校阅中文翻译稿，最后还邀请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属下图书出版部的高级编辑李过先生总校阅，仍不免可以看到许多“翻译”的痕迹，这一点希望读者鉴谅。

最后，我要感谢丰隆集团赞助这本书的出版。

黄锦西  
出版委员会主席  
暨  
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董事经理

144 58/11

# 序

黄锦西先生和柯新治博士找我，要我编这本纪念新加坡经济成长和发展25年的论文集，使我想起过去在新加坡大学（现在称为国立大学）的学术生涯，感到心情愉快。同多数是我的旧同事和学生的学术人员一起工作，我觉得心满意足。当林崇椰教授也参加编辑工作时，我的任务变得更愉快。

这是一本以建国为主题的论文集。由各位作者特别撰写的文章，以分析性眼光对待过去的25年，有些则展望未来。依我看来，尽管作者们接到通知的时间不长，他们的表现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他们的文章和看法代表个人；所发表的意见和有欠周全的地方，也由他们个人负责。

文章作者如下：

阿谢尔博士（华盛顿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学系高级讲师，专门研究公共财政，曾在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Fiscal Documentation*, *Asian-Pacific Tax and Investment Bullet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和 *Singapore Management Review* 等刊物发表论文。他是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的国际编辑顾问，曾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等组织的顾问。

陈寿仁博士（华盛顿大学）。现任社会学系副教授，担任过的职位包括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联合国人口专家。出版了15本专著，发表过无数论文。

周洁梅硕士（美国犹他大学）。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7年，一度担任过短期代理所长，然后才到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工作两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工业国间关系和人力。

李绳毅博士（新加坡大学）。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担任过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发展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华侨银行顾问。研究兴趣包括货币与银行，公共财政，国际金融和经济发展。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Monetary and Banking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Singapore* 和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South East Asia*。李绳毅博士除了撰写“新加坡 货币，银行与金融”一文外，尚协助本书出版委员会联络作者和催稿，贡献良多。

李赐安博士（新加坡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会计与商业研究学院院长，全国职工总会寿险合作社社长，联合国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董事。

刘丽莎夫人。新加坡大学文科荣誉学士，新加坡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和新加坡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系讲师。担任过新加坡财政部税收署助理税务研究员，新加坡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兴趣和著作领域，是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工业发展与人力发展。

欧进福博士（范德比尔特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系高级讲师，也是国会议员和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席。著作包括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Women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The Production and Cost Functions of A Multi-Product Firm”,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1976, 以及 Bela Balassa(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书中一章 “Singapore Experience” (与陈惠兴合著)。

柯受田博士（佛罗里达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1979/80年担任过哈佛—燕京研究院客座教授。他是 *The Research Management Process* (1978) 作者，*Training Management in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s* (1978) 两位作者之一，*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 (1984) 两位编者之一，*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顾问。

苏瑞福博士（伦敦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统计学教授。著作包括 *Singapore Population in Transition*, *Population Control for Zero Growth in Singapore*, *Demographic Trends in Singapore*, *The Labour Force of Singapore*, 和 *The Securities Market in Singapore*。

谢志森博士（曼彻斯特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兼代主任。他担任过特林尼狄大学、密执安大学和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写过有关新加坡政治与行政的论文。

桑达古玛博士（新加坡大学）。他是社会科学硕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系高级讲师。对人口统计学、实用统计学、人力经济学、市场研究和统计制度有特别兴趣。担任过新加坡管理学院、实用研究公司、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南洋商报有限公司和其他私人机构顾问。也积极参与社区社会服务。

陈水华博士。考获工商管理硕士，科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会计荣誉学士（新加坡大学）。现任国大管理学院副教授兼院长，也是管理研究院院长。发表过许多有关管理、劳资关系、公共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专著和文章。

陈惠兴博士（史坦福大学）。考获文科硕士（史坦福大学），文科硕士（新加坡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系副教授。1970年起担任国会议员，1972-76年担任总理政治秘书。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顾问。曾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和 **Malay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文章。

曹圆。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学讲师。她在1978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及统计系，1982年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她的主要研究范围是生产力问题。

我相信，勤劳、有效率的新加坡人民在经过了25年努力，在庆祝建国成功的时刻，把这本论文集献给他们，是最适当不过的。这本集子也可当为是对正确制定和实现各种发展计划的政府机关的正确评价和一种敬意的表达。

游保生

# 目录

|                        |        |     |
|------------------------|--------|-----|
| 前言                     | 黄锦西    | V   |
| 序                      | 游保生    | IX  |
| 引言                     |        |     |
| 回顾我国25年来的变动            | 林崇椰    | 1   |
| 第一部份——经济方面             |        |     |
| 新加坡经济结构型式              | 李赐安    | 11  |
| 1960年以来新加坡外贸及<br>投资的变化 | 陈惠兴    | 34  |
| 新加坡的财政制度               | 穆古·阿谢尔 | 71  |
| 新加坡货币、银行与金融            | 李绳毅    | 97  |
| 第二部份——人口与人力方面          |        |     |
| 新加坡人口趋势、问题与政策          | 苏瑞福    | 127 |
| 新加坡人力资源的发展             | 桑达古玛   | 147 |
| 改善劳资关系之路               | 陈水华    | 170 |
| 新加坡生产力趋势               | 曹圆     | 184 |
| 第三部份——政治与社会方面          |        |     |
| 新加坡的政治演变               | 谢志森    | 211 |
| 新加坡的公共企业               | 刘丽莎夫人  | 226 |
| 新加坡的公共行政制度             | 柯受田    | 256 |
| 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策略          | 陈寿仁    | 279 |
| 第四部份——区域合作方面           |        |     |
| 亚细安经济合作与新加坡            | 周洁梅    | 279 |
| 结论                     |        |     |
| 新加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欧进福    | 320 |

## 引言

# 回顾我国25年来的变动

林崇椰

如果你是在1959年离开新加坡，阔别25年之后重返家园，将会发现新加坡经历了什么变化呢？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这些变化归纳为（一）景物的变化和（二）人口面貌的改变两大项，然后再分成（三）经济的转变、（四）社会变革和（五）政治变动三个题目，详加论述。

## 景物的变化

新加坡景物的最大变化，便是全岛各地增添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有些取代了破旧和低矮的楼宇，但大多数是建筑在旷地或原先用于养猪和种菜的农地上。

今日新加坡大多数著名的旅馆，在1959年是不存在的。同样地，宏茂桥、勿洛、金文泰、后港、裕廊、女皇镇、淡滨尼、兀兰和义顺等新镇，当时也不存在。政府建造的组屋，从1959年的16,142单位，增至1983年的444,316单位。在1959年，新加坡160万人口中，只有8.8%住在政府组屋。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增至250万人口中的77.5%。

除了数不清的新住宅、旅馆、银行、工厂和商业的建筑物之外，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公路比过去宽广得多，林木也更加青葱。公路网增添了新的大道，包括泛岛快速公路——把设在樟宜的巍峨壮丽的新国际机场，和裕廊工业区连接起来——那里原是荒地和低洼的红树林沼泽地，经过改造和建设，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工业区之一。在全岛各处，还开辟了许多较小的新工业区。

坐落在珊顿道旁的职总大会堂，如今有一条两边通车的大道，人们可以驱车穿过新建的薛尔思桥，直抵新建的樟宜机场。这片

土地长20公里，全是填海地带。如今，填海地两侧林木青葱，分布着公园、大厦、办公大楼和公寓。

1959年闻名遐尔的蓄水池是麦里芝蓄水池、庇雅士蓄水池和实里达蓄水池。新加坡如今拥有更多蓄水池，包括克兰芝蓄水池、班丹蓄水池和勿洛蓄水池。

新建的游乐园有飞禽公园、动物园、裕华园和星和园。旧式娱乐场已经关门，原因是新加坡人的爱好和习惯有了改变。著名的植物园面貌依旧，而且继续受到良好的照顾。

肯特岗一度近乎是荒地，供英军使用，如今高楼林立，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址。新大学还在扩建中。

如果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也会注意到新建的游泳池比比皆是。以每平方公里土地与游泳池数字相比，新加坡的比例如果在世界上不是首屈一指，至少也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每一处共管式公寓，都少不了一个游泳池。同样地，每个公共住宅区也少不了一个符合奥林匹克运动会规定的标准游泳池。

近海的绝后岛改称圣淘沙岛(意为宁静之岛)，并发展为渡假胜地；另一个人烟稀少的近海岛屿——德光岛，如今主要是供作军事训练用途，而渺无人烟的海岛——巴歪岛和安乐岛，我国空军几乎无日不在那里进行轰炸演习。其他近海岛屿已发展为炼油中心，使新加坡崛起为世界第四大炼油中心，却不因此而污染大气层。

50年代为人熟知的贫民窟，几乎完全消失。历史性的新加坡河也变了样——河面已见不到舢舨和驳船穿梭，不再散发臭气，因为这些船只都被“重新安顿”在别处。新加坡河甩掉周身的齷齪，澄清的河水，成了鱼儿生活的场所。

对怀旧的人来说，可以告慰的是，目睹最高法院、市政厅、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坪、皇后坊、新加坡立法议会大厦(现改名为国会大厦)和浮尔顿大厦历尽沧桑，风貌未改，使人想起往昔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的荣耀。

过去几年，建筑业仍然是增长最迅速的行业之一，不仅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率的增长，而且导致新加坡景观发生变化。大众快捷交通系统于1984年开始兴建，完成后将进一步改变我国的景观。

进入新加坡港口的船舶数目，也急剧增加。以纪录在册的吨数而言，1983年达到188,332,000吨，使新加坡崛起为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鹿特丹。

## 人口面貌的改变

这位阔别25年才重返家园的人士也将发现，1959年4%人口增长率所造成的人口急速增加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1983年的人口适度增长率：1.1%。

人口的种族多元性大致不变。华人仍然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马来人和印度人。不过，这位回国人士会发现，他们不分老少，都把自己叫做新加坡人，而不论自己的种族出身。可是，在1959年，实际上是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人”这个字眼甚至还不存在呢！

上述人士无疑也会注意到，人口的年龄构成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1959年，人口的52.7%是在20岁以下，到了1983年，这个年龄组的人，降至35.5%。老人问题如今备受关注。

出外工作的妇女日益增加，而且入息颇丰。反观1957年，年龄在1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大约21.6%受雇，收入可观；相比之下，这个数字在1983年上升到45.7%——既反映就业机会增加，也反映新加坡妇女的职业态度。

抵新旅客人数剧增。1983年，有将近300万旅客访问新加坡。相比之下，1959年旅客微不足道。此外，还有侨居新加坡的外国人，包括日本人、美国人、澳洲人、英国人、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他们的身份是投资家；包括工商金融企业家和经理人员。1984年新加坡还有许多外来劳工，他们来自韩国、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和斯里兰卡。根据估计，这些外来劳工，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工人，约有16万名。

1959年新加坡的失业率高达13.5%，1983年降至3.2%。经过10年，新加坡出现全民就业景象。尽管在这个时期内，几乎所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都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

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59年的69岁，增至1983年的72岁。在同一时期，婴儿死亡率也从每千名新生婴儿中的36个，降至每千名新生婴儿中的9.4个。目前我国婴儿死亡率，名列世界婴儿死亡率最低国家之林。

1959年，肺病病是主要杀手，到了1984年，心脏病则成了第一号杀手。营养不良导致的大肚腩，已经被饮食过量导致的大肚腩所取代。

简而言之，自治初期的人口急速增加，已经被货物和劳务生产所取代。

在新加坡，生育的偏差问题依然存在：入息低和教育程度低的夫妇，生育的儿女比高入息和受过高深教育的夫妇来得多。

富人得财、穷人得子”这句谚语，不仅在国际比较中是正确的，在一国之内也是适用的。然而，新加坡政府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少有的政府之一，具有决心、勇气和财力，为人息低和教育程度低的夫妇提供奖励措施，帮助他们减少儿女的数目；另一方面鼓励受过高深教育和人息高的夫妇，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由于这项计划是新的，在新加坡引起一番争论是在所难免的。

## 经济的转变

在经济上，1960至1983年常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是9%，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每年7%的增长率的基础上，按人口计算的实际平均入息，连同一般的生活水准，将在10年内增加一倍。196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当时的物价为基准，每人是1,215新元，而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增至12,890新元。

整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除了1973—1974年因石油危机而出现了十位数通膨率外，在1960—1983年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只有3.8%。这是世界上通膨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撰写此文时，以色列的通膨率超过400%，尽管它的国民禀赋过人。相比之下，1983年新加坡的通膨率是1.2%。

在过去25年内，新加坡经济的结构也经历过重大的变革，这反映在职业组合的改变，以及通过增值对国内生产总值作出贡献。在传统的转口贸易领域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工业领域，一个重要的旅游业领域和一个重要的金融业领域。

即使是转口贸易领域，也发生剧烈的变化：从处理东南亚地区的土产，包括橡胶、锡、棕油、木材和胡椒，转变为处理来自更大地区的石油和制成品。换言之，石油和制成品的再出口，特别是资本货物的再出口，已经成为新加坡转口贸易的支配模式。

1959年，制造业领域雇用的员工，只占劳动力约7.5%。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增至27.8%。更值得一提的是，制造业领域本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从生产增值低的劳工密集产品，转变为生产增值高的资本密集产品<sup>①</sup>。不但在制造业领域中应用机械、电脑和机械人，在经济的其他领域中也是如此。

因此，国民储蓄率（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从1960年

---

① 关于制成品、出口和再出口变化的更详细论述，请见本文作者的论文：《制造业的贸易：新加坡的透视》。该文于1983年6月提交给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的关于制成品贸易太平洋合作特别工作组会议。

的7.9%，增至1983年的40.1%。这些储蓄率比国内固定资本形成的总额的比率为低，因为后一个概念考虑到外国投资。譬如，1983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48.2%。以国际标准来说，这个比例是极高的。

高储蓄率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强制性储蓄率高。从1984年7月1日开始，强制缴交公积金的数额，提高到工资的50%——即雇员缴交25%，雇主也缴交25%。

新加坡正成长为区域金融中心，这一部分反映在新加坡银行处理的亚元存款方面。亚元存款开始于1968年，截至1983年底，总额达致1118亿6千1百万美元②。

50年代和60年代此起彼伏的工潮，到了70年代初几乎完全消失。由政府、劳方和资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于1972年初成立，在新加坡揭开了制定工资政策的新篇章。全国工资理事会通过务实的工资指导政策，对促进和维持工业安宁作出贡献。

新加坡的地位，在整整25年内一直是非常强大的。譬如，英镑对新元的比值，从1959年的8.5714新元兑换1英镑，降至1984年6月底的2.9156新元兑换1英镑。

新加坡在经济领域内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增长，原因之一是在整个时期内，她让自由的企业制度在政府必要的支持和干预下欣欣向荣。在国际贸易的重要领域，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在国际商品贸易领域内，从1959年的39亿820万新元升至1983年的595亿420万新元③，几乎全部活动是操在私人企业家手中。如果新加坡在国际贸易方面选择不折不扣的国营企业，那么她的成长将受到影响，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经济变革之所以有条件实现，也因为外国企业，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大量涌入④。目前知道的情形是：在1981年，这类企业雇用制造业劳动力约58%，占出产的76%。这些公司也承担了87%的直接出口和72%的资本开支⑤。

## 社会变革

在经济学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被广泛地用作经济变化

---

② 参阅李绳毅论述新加坡金融和银界业成长的专文。

③ 1983年数字不包括对印尼的贸易。

④ 关于新加坡经济变化的更详细的论析，见本文作者的专著：《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联邦出版社1980年）和《新加坡经济重组问题》（联邦出版社1984年）。

⑤ 见陈惠兴博士的专文。

的指数。然而，却没有相应的便于采用的单一指数，可衡量社会的变革。

教育水平也已大大提高。譬如，1960年和1983年的在籍小学生大致相同，分别为284,702名和290,800名。但是，1983年在籍中学生的数目是182,343名，比1960年的59,244名增加了2.8倍。同样地，在同一时期，大专学生人数，也增加了2.8倍。

文盲率从1970年的28%，下降至1980年的16%。人口与医生的比例，从1959年的每2531人拥有一名医生，降至1983年的每1060人拥有一名医生。

然而，由于更多妇女走出家庭，谋求报酬丰厚的职业，加上生活水准不断地提高，妇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传统的大家庭制度转变为小家庭制度，以及职业模式的变化，致使生活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家庭宁小勿大，或根本不生育儿女。这种急剧变化的进程还在继续中。

关于消极方面，社会问题已开始显现。在70年代，离婚案件增加473%，毒品罪案增加67%。同样地，在1973—1983年期间，强奸案增加57%，非礼案增加300%。我国年轻人对男女关系的态度也有了改变：197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中，大约7%有过婚前性关系的经验，这个数字在1977年上升到24%⑥。

## 政治变动

评估新加坡在自治后的成就，如果不考虑到至关重要的建国事业，便将流于片面。当新加坡争取到自治的时候，不论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心理上，她都是马来亚的一部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三地组成的海峡殖民地，是成立于1924年，当时是在孟加拉政府的管辖之下。1827年，海峡殖民地的首府，从檳城迁至新加坡。马来亚，更精确的说法是战前的英属马来亚，是由3个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4个州（吡叻州、雪兰莪州、彭亨州和森美兰州）及马来属邦5个州（柔佛州、吉打州、玻璃市州、吉兰丹和丁加奴州）所组成。战争结束之后不久，马来联邦的建议流产，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和直辖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独立。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人民行动党在同一年上台执政，后来一再蝉联，直到今天。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英属北婆罗州（沙巴）和砂劳越合并，成立新的马来西亚联合邦。这项合并是不愉快的。1965年8月9

---

⑥ 见陈寿仁博士的专文。

日，新加坡终于脱离马来西亚联合邦，成为一个独立国。

新加坡领袖在自治时期，获得管理国家的经验，因此当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她拥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袖——李光耀先生，也是新加坡自治政府的首任总理。直到今天，李总理仍然是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而不仅仅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领袖。在整个时期内的其他杰出领袖，还包括吴庆瑞博士和拉惹勒南先生。

新加坡成功地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这个英明能干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层，一直保持着连续性。在转变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成就，便是为了保卫这个新国家而进行军事上的准备。诚然，不仅是在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而且在脱离大马之前，国防不是新加坡人认真考虑的问题——它是英国人的职责，后来担子落在马来西亚政府肩上。“新加坡人”这个字眼，正如前面提到的，直到新加坡脱离大马而独立后才出现。

1968年，新加坡在脱离大马之后约3年，便开始推行国民服役，所有男性青年必须接受军训。经过一段时间，一支完整的公民军队便诞生了。国民服役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它也是建国的手段之一。在整个时期内，由于贪污绝迹，政府的声望日隆，备受推崇。

独立后，经济问题备受关注，经济战线上捷报频传，人民行动党领导层于是有能力动员全民，朝向进步和繁荣的目标迈进。自1965年独立以来，总共举行了4次大选（1968年，1972年，1976年和1980年），人民行动党在各次大选中都囊括全部席位。只有在1981年安顺区的补选中，一名反对党人士获选成为国会议员。

然而，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的胜利，使它的领袖信心十足。这些胜利使政府可以增强对群众的影响。如果自治前的新加坡是一个组织松懈的社会，那么现今的新加坡无疑成了具有高度纪律性和组织性的国家。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由于过去新加坡如此依赖几位杰出人物，特别是李光耀总理为首的英明能干和任劳任怨的领导层，因此一谈起未来，领导层的接班问题，自然成了新加坡一切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问题。谨慎挑选的第二代领袖，已从第一代领袖手中承受了积累起来的庞大权力，但不是积累起来的权威。第二代领袖能否以同样的献身精神，英明能干地领导国家，还是个未知数。倘若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崛起为领袖，人们对于他们在李光耀时代结束后领导国家的能力所存的疑虑将会大大减少。然而，在新

的把舵人领导下，新加坡人必须对不同的未来有所准备，但愿任何的悲观想法，都是无的放矢的。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个国民历史的真正进程。在这期间，新加坡全体人民对他们的集体的成就，大可引以为荣！

# 第一部份

## 经济方面